

学林漫录

十集



學術選錄

十一



學 林 漫 錄
十 集

封面题签 李一氓
封面设计 谈冰玉
编辑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学 林 漫 录
十 集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1/32·9 1/2 印张·225 千字

1985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湖北第 2 次印刷

印数 8001—11000 册 定价: 13.00 元

ISBN 7-101-01740-1/I·293

目 录

秋夜话谢老	王春瑜 (1)
忆孙蜀丞先生	刘叶秋 (13)
记与向达先生的一段接触	诸天寅 (19)
《忆周予同教授》补正	叶至善 (26)
坚净居随笔	启 功 (28)
也记联圣大方	周一良 (36)
读《陈师曾遗诗》零墨	朱金城 (39)
冲破封建樊篱的教育总长	牟小东 (50)
敕勒歌二题	李裕民 (63)
吴钩考	王稼句 (67)
古敦煌民间葬俗	高国藩 (72)
说唐代的“进士团”	傅璇琮 (80)
樊素小蛮考	肖瑞峰 (86)
唐诗两地名考辨	刘 满 (93)
漫话北宋宫廷女子马球队	孔宪易 (102)
“半部论语治天下”探索	张其凡 (108)
《醉翁谈录》所载小说名目本事考	谢 悦 (115)
胡瑗孙复石介同读书泰山辨	陈植锷 (120)
绍熙废立初探	袁 征 (123)
三槐王氏考	王剑英 (127)

书林续记	雷梦水 (134)
路衍淳藏本《北堂书钞》述略	吴树平 (149)
似曾相识燕归来	金性尧 (162)
墨苑丛札	周绍良 (168)
明代的茶陵诗派	周寅宾 (180)
释“左辖”“右辖”	[美]马泰来 (189)
关于《牡丹亭》札记三则	吴小如 (192)
吴炳降清后死于痢疾考	蒋星煜 (203)
《鸳湖曲》笺证(吴昌时事辑)补记	黄裳 (213)
晚清戏剧家陈烺系年考略	谢伯阳 (223)
读龚自珍《书金伶》	陆萼庭 (234)
冒辟疆《卖字五狼偶成绝句》本事	顾启 姜光斗 (243)
《郑板桥行书真迹》中的八首词	卞孝萱 (249)
清诗札记	朱则杰 (254)
简介清代稿钞本日记十二种	陈左高 (260)
姚鹓雏的《饮粉庵笔语》	郑逸梅 (267)
汪辉祖及其著述	邓云乡 (272)
清末所谓清流党前后与其言事大略	陈兼与 (290)

秋夜话谢老

王春瑜

一、生平一瞥

谢国桢教授，号刚主，生于一九〇一年四月。史学界都熟知，他是河南安阳人；他在自己的藏书题跋中，以及给别人著述的题签上，都写明“安阳谢国桢”。不过，他在平时闲谈中，却常常以江南人或半个江南人自居，并以喜欢听——当然，首先是听得懂——苏州评弹而自豪，以及庆幸在十年浩劫中，他与顾颉刚先生一起蹲“牛棚”，扫地时，能听懂顾先生的一口苏白，别人听不懂，少惹了不少麻烦。大约是前年夏天吧，有次晚上我去看谢老，闲话中，谈起他在清华研究院时的同窗陈守实教授。他说：“守实是常州人，但脾气大，可谓南人北性；我是安阳人，但万事无所谓，难得发火，可谓北人南性。其实，我的脾气好，像南人，也还有点历史原因：我的祖籍原在常州，我也算得上是南人或半个南人。”一九七八年，谢老在南下访书时，当列车从奔牛站驶过，他指着窗外，对同行者说：“这是常州奔牛，我的老家就在这儿。”据谢老说，他的祖上因为觉得江南人文荟萃，考举甚难，所以才迁到北方来，犹如今日高考，考生少，竞争小，容易录取云云。二十余年前，我读过谢老写的《三吴回忆录》；此书似乎是先在《中和》杂志上发表，以后才出单行本的。书中，回忆他在江南访书的情况，同时寻亲访友，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春江烟雨、深巷卖杏花的江南，一种游子眷恋故乡的深情。

世界上确有早熟的儿童，有的尚在襁褓中，便颖慧绝伦。就此

而论，谢老的童年，平淡无奇。他在《自述》（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中说，“我从小就愚钝”，也许是过谦之词，但老先生当年长到六岁了，还不怎么会走路，却是事实。他在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中，是长孙，受到其先祖谢仲琴的关怀，特别是颇受其祖母朱夫人的溺爱，起小名大保（宝宝之意）。十分难得的是，这位老太太是有文化的，每天晚上都在灯下给孙儿讲故事，并教他念《诗经》、《唐诗三百首》，给他念千古绝唱《长恨歌》、《琵琶行》中的名句。这对谢老后来的酷爱文史，显然有很大影响。一九七二年的中秋节前夕，谢老虽已年逾古稀，在写《〈何氏语林〉跋》（见《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时，仍充满深情地回忆着儿时祖母对他的教诲：“又喜听祖母为余讲故事，瞪目静聆，每至更阑，催督者再而犹不肯入睡。回首童年，恍如昨日事。”看来，朱夫人是童年时对他影响最大的启蒙老师。

谢老的父亲谢锡成，是以游宦为生的，沾染旧习甚重；谢老曾骂他“挥霍成性，不久有了外室，把我的母亲和我们兄弟二人（胞弟国栋）置之于不闻不问之列”。不过，谢老并没有因此忘记，乃父毕竟曾为他请了一位家庭塾师，教授诗云子曰那一套。教学效果如何？谢老晚年回忆说，“懵懵懂懂”，“真是‘读《中庸》屁股打的鲜红’！”

流年逝水，不舍昼夜。一九一九年春天，谢老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了，跟他的老弟一起从安阳来到北京上学，进了汇文学校的大学预科。但是，由于本来所学的，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所谓国学，对英文、数学之类新学，一无所知，基础太差，因此毕业后，考北京大学的文科，连考三年，都名落孙山了。前几年，他在复旦大学分校历史系讲学时，回忆这段经历，十分感慨地说：“当时，我每当走过沙滩，心里就感到悲观绝望，叹息着，自言自语：看起来，我这辈子是进不了大学的门了！还谈什么做学问？我算完了！”然而，实践

证明，谢老并没有因此完了。天才就是勤奋。终年挥汗如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最终是会获得丰收的。后经著名文学家桐城吴闿生(号北江)先生的指导，谢老发愤图强，努力攻读，终于在二十五岁时，即一九二五年秋天，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八〇年夏天，亡师陈守实教授的夫人王懿之先生，曾经给我看过陈先生早年的日记，记载投考清华前后事甚详，包括考试内容。其中，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英语等项目。有的考生(包括陈先生在内)还事先寄去自己的学术论文。谢老的清华同窗中，后来绝大多数都是中国文史学界的著名学者；于此不难想见，谢老当年能考取清华，并名列榜首，实在不易。

考取清华，是谢老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他学术事业的真正起点。在导师中，学术大师梁启超跟他的关系最密切，影响深远。他的明清史学、目录学，后来能取得很大成就，实在得力于梁氏的指点。尽管梁启超从清末以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在清华当导师时，却平易近人，对弟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谢老在清华，固然常常得到梁启超的指导，更难得的是，一九二六年，他在清华结业后，即随梁氏至天津家中，担任其子女梁思达、梁思懿等人的家庭教师，同时继续从梁氏问学。他们同桌吃饭，茶前饭后，经常听任公论学，真是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汪洋恣肆。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谢老重读他在一九三四年写的《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当年在饮冰室的往事，梁任公对他的深情厚谊，宛如昨日，历历在目，思绪茫茫，纷至沓来。他提笔写道：

一九二七年夏，桢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结业之后，即馆于天津梁任公师家中，……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听。先生朗诵董仲舒《天人三策》，逐句讲解，一字

不遗。余叹先生记忆力之强，起而问之。先生笑曰：“余不能背诵《天人三策》又安能上万言书乎！”。先生健于谈，喜于教诲，有时朗颂苏长公、陆放翁之诗词，有时伏案习魏晋六朝人书，以寄托其于悒不平之气。每饭余茶后，茗碗之间，为桢讲研究历史之方法，及明末清初甲乙之际史迹，桢辄引笔记之。桢之所以略知史部簿录之学，纂辑《晚明史籍考》，掣治明季“奴变”，清初东南沿海迁界，江南园林建筑，以及南明史迹，粗有辑著，皆由先生启迪之也。（《明末清初的学风》第279页。人民出版社。）

次年即八〇年夏天，谢老在《我的治学经历》（见《书林》一九八〇年第五期）一文中，又补充写道：“由于我读过梁先生著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及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因之我曾研究过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梁先生又给我讲明末清初的遗事，我之所以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就导源于此。”谢老是个虚怀若谷的学者，晚年吟哦“忆昔梁门空立雪，白头愧煞老门生”之句，这固然是过谦了，但是，若非梁门曾立雪，焉能中外传盛名？应该是千真万确的，没有梁启超的熏陶，就不可能有谢老的学问成就。

一年后，谢老离开饮冰室，并由梁启超介绍，到南开中学任中文教师，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一直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致力于版本目录之学，先后在云南大学、北平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执教和任职。一九四九年五月，经范文澜同志介绍，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同年九月，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九五七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研究明清史，直至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病逝于首都医院，享年八十二岁。

二、硕果累累

谢老在晚年颜其书斋曰“瓜蒂庵”，并请金石家钱君匋治印一方。八二年四月，他赠给我们明史研究室的同人每人一部《增订晚明史籍考》，并亲笔题款，盖上“瓜蒂庵”的印章。当时，我们在感激之余，也曾窃窃私语：语曰瓜熟蒂落，于老者未免不吉。没有想到，不幸而言中，仅仅四个月后，谢老即与世长辞了。但是，正如他在生病前不久写的一首诗所说的那样，“拾得瓜蒂结瓜成”，在他的“瓜蒂庵”中，著述如林，给史学界留下了累累硕果。单篇论文不算，从一九三一年以来，他陆续出版的学术著作、史料，即有：

《顾宁人先生学谱》，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一年，一九五七年，易名《顾亭林学谱》，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

《黄黎洲学谱》，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二年，一九五七年，由上海商务再版。

《孙夏峰、李二曲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二年。

《清开国史料考》，北平图书馆，一九三一年。

《清初史料（四种）》，北平图书馆，一九三三年。

《晚明史籍考》，北京图书馆，一九三三年，一九六四年增订，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重印。

《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明代边疆之书），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影印）。

《吴大澂尺牋》，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影印）。

《三吴回忆录》，蠡鱼编辑印本，一九四三年。

《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开明书店，一九四八年，一九八〇年，易名《清初东北流人考》，编入论文集《明末清初的学风》。

《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八一年出版。

《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黑龙江通志稿艺文志》，《黑龙江通志稿》印本。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已出版（影印）五种。

此外，谢老还有几本已写完的书稿，如《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史科学概论》、《江浙访书记》等，正由有关出版社整理待印。

在谢老的著作中，我最偏爱的是《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晚明史籍考》，实在是一部巨著。今天，史学界对晚明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回顾近代史学史，晚明史、南明史的研究，曾经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个高潮是辛亥革命前后。当时的革命党人，为了反满的需要，表彰南明时期抗清志士的英勇事迹，以“发潜德之幽光”，激励民气；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清朝的禁书，陆续重见天日，搜集、刊布南明史料，蔚然成风。今天我们重新读一读这一时期出版的《浙江潮》、《华国》等杂志，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动向。梁启超也喜欢谈南明史，对甲乙之际史事极博洽，也是上述思潮的产物。第二个高潮是抗日战争时期。蒋家王朝的腐朽统治，导致国势日颓，民不聊生，强寇入侵，山河破碎，很容易使人们想起明末，想起南明。辛亥革命的元老、南社的中坚、著名诗人柳亚子，奋力搜求南明史籍，报刊上不断有南明史的文章出现，以及上演南明史剧，便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谢老的《晚明史籍考》，著成于两个高潮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此书原版二十

卷，增订后为二十四卷，并加补遗，长达八十二万余字，采辑明代万历以来至清朝康熙间野史、稗乘及宫词、诗话、小说、传奇，辑成提要，录其序文、凡例，并加上按语，指明此书版本源流、史料价值。著名史学家朱希祖在此书的初版本中，曾经写了一篇序，其中有谓：

“安阳谢君刚主，有‘晚明史籍考’之作，起于万历天启，讫于台湾郑氏之亡，明历告终，成书二十卷。盖自万历以来，记载繁颐，忌讳孔多；顺康之际，大兴史狱，至于乾隆，广搜博采，一概禁毁。故明史自万历后，缺略讳饰，在所不免。清史稿于南明三朝，亦语焉不详。至于今日，收拾烬余，百无一二，即偶有遗编，然流传既远，什袭弥珍，欲思补苴阙佚，匡正违误，盖綦难矣。……自非气魄弘伟，毅力坚贞，勉有不望而生畏者。谢君秉承师教，成此巨编，阅时已及四年，奔走几及万里。凡通都大邑，官私藏书，靡不借览，旁及日本朝鲜，力所能及，亦常钞译不倦，盖廛廛初稿，而所费精力已为人所不能及矣。”

这里，朱希祖对《晚明史籍考》成书的艰难，谢老用力之勤，言之甚详，实际上，亦已指明了它的重大学术价值。今天，研究明末及清初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这本书为入门响导，然后才逐渐步入堂奥的；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时翻检此书，从而断定所用史料的价值，或者在此基础上，再去进一步开掘史料，扩大研究的范围。如果没有谢老的这部大书，治明末清初史者，面对茫茫书海，很可能将不知从何处下手，查找稗官野史中的史料，即使化了很大功夫，恐怕难免要挂一漏万，大走弯路的。毫无疑问，《晚明史籍考》将会一直流传下去，成为研究明清史学者们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当然，任何学者都有他的局限性，本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把现代人的著作也编进去，未免是自乱体例；有的提要写的不精确；个别书的作者生平，方志有记载，而谢老未及翻检，以致阙如；有的史籍漏载；国内外新发现的史料，未能补上；有的书版本

有误，等。当然，这些不足之处，决不会影响全书的学术价值。学如积薪。我想，史学界的有志者，完全可以对此书继续增订，使它更臻完善。

清初的某些史学家，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常常断言是亡于党争。这是有相当的道理的。万历以后，宦官专权，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阉党、东林党之争，沸沸扬扬，直至明亡。尤其魏忠贤秉政后，对东林党人残酷地打击迫害，朝臣中的东林人士，罢斥一空。但是，天启皇帝死后，东林党的潜在势力，又借崇祯皇帝剪除魏忠贤的机会，重新活跃起来，极力想如法炮制，把阉党及与阉党有关的人，也统统一网打尽。两派政治力量继续较量着，一直闹到明朝灭亡后，还在南明弘光小朝廷流波不息，重开内战；甚至在清朝的顺、康之际，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场斗争的余绪。显然，明末清初的党争，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结社，是明清史上的一大关节，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不仅是对明清政治史，而且对思想史、文化史，都是一大贡献。谢老在编《晚明史籍考》时，即有志于此，随手将有关明季党争和社盟的材料，抄录下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从日本游学归来，在北平图书馆编纂室，化了三个月的功夫，即以当年所抄材料为依据，写成《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九三四年由商务刊行。该书计十三章，附录四篇。展读全书，我们对从万历至南明三朝乃至清初的党争，对大江南北的各种结社，便一目了然。谢老显然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笔端常带感情；在这本书里，感情激越、低徊三叹、宛如采采流水的文句，不时在我们的眼前闪现。鲁迅盛赞此书“钩索文籍，用力甚勤”（《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是再恰当不过的评价了。

限于篇幅，我不打算对谢老的著作，一一介绍。但必须指出，他的治学面是很广的。他的学生任道斌把他的学术归纳为六个方面，即：一、明清之际阶级关系的研究。二、明末清初学术文化史的

研究。三、明代经济史的研究。四、南明史的研究。五、明清史料、史籍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六、汉碑和汉代社会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如果加以补充，我以为应当添上一条：对版画史的研究。在上述诸方面，有不少成果，与《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样，都是开创性的，如《清初流人考》、《南明史略》等。总之，他既博且约，于明清史学，硕果累累，对明清史籍、史料的搜集整理，更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佚事点滴

往事历历如昨。经过十年浩劫后，我第一次重见谢老，是在上海他的女儿谢纪青同志家中。那时，我还在上海工作。对谢老在“文革”中的历经劫难，我是早有所闻，他的老伴谢师母也已离开了人间。因此，见面时，我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安慰他的话，唯恐说的太直白，引起老人伤感。但是，没有想到，我还没有说完，他就打断我的话说：“这算不得什么！我早听说了，你还年轻，就被‘四人帮’迫害得家破人亡，又何况我们这些老人。你也是研究明史的，看看明末、南明，我们就能懂：政治大乱，知识分子的命运可就惨了！好在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结束，我们还是赶紧做学问吧。”说着，他又笑着说：“文化革命，倒是缩短了今古的距离。运动一开始，就勒令我和顾颉刚先生扫地。我扫着，扫着，看看顾先生和自己这一对老头儿，不禁小声对顾先生说：“你看，我们两个多像《空城计》里扫街的两个老兵！”我笑了，谢老更是哈哈大笑，口水滴在衣襟上。我顿时感到，谢老的心，善良、纯真得多像个孩子呵！过了几天，我又去拜访谢老。时正大雪之后，泥泞不堪的道路，结冰后，很滑，马路上的行人，不时跌倒。可是，一见面，谢老却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上午，我坐公共汽车去城隍庙，在那里吃了八只汤团。”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对生活是这样热爱，区区困难，不在他话下。需知，从

复旦大学到城隍庙，路很远，要倒几次车呢。

不久，我调到历史所工作，并与谢老同在明史研究室。这样，见面的机会很多，我不时去永安南里他的家中，向他请教，或者借书。几十年来，他对明清史料，特别是野史、笔记搜罗之勤，藏书之丰，国内史学界无人望其项背。但是，对这些史籍，包括不少海内孤本，他决不像古代某些藏书家那样，藏之名山，秘不示人。所内外的同志，包括从天南地北登门求阅的同志，谢老都欣然借出。他曾跟我说：“只要是做学问的人找我借书，我都是来者不拒。一部书，有很多人看，总比我一个人看，发挥的作用大。”惟其如此，他的房间里，常常是来客满座，川流不息。去年春天，谢老大病一场，从医院回家，康复不久，登门求教、借书者，又陆续盈门。谢老仍像往常那样，热情接待。不久，我们研究室知道了这个情况，认为再这样下去，将严重损害谢老的健康，他的弟子商传同志便在谢老家门上贴上“因健康不佳，概不会客”的“公告”。但是，这一张纸，两行字，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谢老一生好客，没有半点大学者的架子，与新闻出版界、书店、学术界，有广泛的联系，朋友太多了！这一张“公告”，又怎么能将他的熟人、友人，拒之于门外呢？他对后辈、青年的热心指导，大力扶持，更是数十年如一日，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就在他逝世前三天，我们研究室给某高校准备提升副教授的一位同志作学术鉴定，我和刘重日同志在书面意见上签字后，我去医院征求谢老的意见。他坐在沙发上，将这份打印的意见认真看了一遍，又询问了一些有关情况，热情地说：“我完全同意。”说着，便拿起钢笔，郑重地签上他的名字。“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谢老在他的晚年，不仅孜孜不倦，日夜笔耕，又出版了《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明末清初的学风》等数本著作，给史学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感人至深的是，直到临终前夕，仍以满腔热忱，关怀他事业的后辈。这种

崇高的精神境界，足为学人风范。

谢老是国内外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五十年代初期定级时，谢老仅被定为四级教授，直至去世。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与他的学术声望，太不相称了。但是，他从未怨言。去年八月三十一日，也就是他临终前三天，我去医院照料他。这时，他的病情已经好转。整整一天，他除了休息、吃饭外，即不时与我聊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两天后，他的病情就突然恶化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为他的健康好转而高兴，并祝他寿至期颐时，谢老却摇摇头，深沉地说：“不，这一次我肯定不行了。不过，我已活到八十多岁，也算得上高寿了；我想出版的书，都出版了；我虽然级别不高，但承蒙所内外，甚至海外的学术界朋友们，都瞧得起我，我心情很舒畅。我眼睛一闭，毫无遗憾。”这是一位预感到死神即将降临的老学者的心声。透过心声，我清楚地看到了谢老的博大胸怀。

说真的，也许确实是生物学家们所说的“生命钟”在起作用，谢老在去世前的一年间，似乎就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的老友郑天挺先生去世后，他很伤感，随即就去医院，问医生：我能不能活到一年？当时，医生感到很惊讶，一再宽慰他。可是，谢老却默默地料理着身后事。其中，最重要的，他写了《自述》，并在八一年底，公开发表在《文献》第十辑上。他回顾了一生走过的道路，说到曲折处，没有半点掩饰，坦荡胸怀，跃然纸上，这在当代学者写的自传中，我还没有看到有第二个人，能像谢老那样无情地剖析自己。尤其使人不能忘却的是，他总结自己六十年治学的体会，说：历史科学“总的说是与政治分不开的。因此，研究历史必须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具体事实作具体分析。”我坚信，这是谢老的肺腑之言，实际上也是他留给史学界最重要的遗言。

“一角悬崖一角山，秋心寂寞绕汀湾”。不过，我相信如果谢老